

一位蘇聯中學校長二十五年教學經驗



原著者
譯者

[蘇聯]諾維考
景

上海大韓出版社出版

一位蘇聯中學校長的二十五年教學經驗

原著者 伊凡·諾維考夫

譯者 景明

上海大略出版社出版

一位蘇聯中學校長的

二十五年教學經驗 32 開 40,500 字 84 用紙面 定價 ¥8,900

原 著 者	ИВАН·НОВЦКОВ
譯 者	景 明
出 版 者	大 路 出 版 社
發 行 者	上 海 虎 丘 路 128 號
印 刷 者	東 南 印 書 館
	上 海 新 閘 路 566 弄 24 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地 公 私 營 書 店

1954 年 1 月初版(印數) 0001—3000 冊

一位蘇聯中學校長的二十五年教學經驗

關於作者

伊凡·諾維考夫，在一八九一年生於杜拉省扎克哈羅夫卡村。他的父親庫茲瑪·諾維考夫是一個農夫。當伊凡還在幼童時期，就已不得不在他家的小塊的土地上幫助工作了。

他受了四年教育，以後又由兩年制的師範學校畢業。當了一個時期的小學教師以後，他升任鄉村小學學校的校長。若不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發生，俄國人民掌握了政權，千百萬人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以發展他們的才能，那麼，沒有疑問地，這個農民的兒子的教育和事業必定以此爲止了。

伊凡·諾維考夫獻身教育已經四十年。其中有二十五年他是充任莫斯科第一百一十中學校長，在這個崗位上，對蘇聯青年一代的教育有卓越的貢獻。同時，他不斷努

力充實自己的學識。自從就任第一百一十中學校長職務以來，他已經從莫斯科大学畢業，修完了四年地質專科，獲得了教育學碩士學位，而且還在教育科學院進行了深造的研究工作。

伊凡·諾維考夫在教育界以外也是很著名，很受尊敬的。首都的人民把他選為莫斯科蘇維埃的代表，同時他又是最最高法院的人民陪審員，這個職務是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任命的。他在第一百一十中學校的優良成績，為他博得了蘇聯政府的崇高的評價。他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優良教師，並且曾經兩度榮膺列寧勳章。

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我又站在位置在麥茲魯阿柯夫斯基街的過去許多年來彷彿是我的家的校舍門前來接待我的學生了。這是我第二十四次來歡迎第一百一十中學假滿歸來的學生和初入校的孩子們。那一天，成千成萬的蘇聯教師在歡迎三千二百萬名男女學生入學。我是這些教師中的一個。

新生們都揹着書包，拿着紙夾子，有許多還帶着鮮花，和他們的父母同來。他們大多數都是在響鈴以前到校的。他們的父母告訴我，他們頭一天晚上連覺都睡不着。我自己呢，坦白地說，也沒有睡多少時候。許許多多的回憶湧入我的腦海，於是發生了一連串的思潮。我並沒有回憶革命以前中學校一年級生所受到的接待的情況，因為我是生長在鄉村裏，當然在那個時候，在鄉村裏中學還是聞所未聞的。但對我來說，作家菲·吉·科羅連科的證據是極可信的，他描寫當時的情況說：『……假如我們幻想着中學生制服，那就好像一個青年的武士要和一個危險的仇敵去戰鬥的野心一樣……』。

看着九月一日開始學習的一羣孩子，我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的情緒是何等的不同啊！的確他們是很興奮的。也許一起頭他們對新環境要感到一些生疏。不過他們很快地就克服了這個點，沒有羞縮的樣子了。我在禮堂的講台上問他們，到學校來是爲了什麼，那時，他們異口同聲地，用滿懷自信的嘹亮的聲音回答說：『學習！』我告訴他們，我們要贈送好書給成績優良、有模範行爲的學生作爲獎品。我問他們誰願意爭取得這個獎品，那時，他們全體都舉起手來。

我又問誰願意得「二」分，他們又立刻都舉起手來。但過了一會兒，孩子們想過來，都樂起來了。我看，他們很明白「二」分是一個壞分，「五」分是一個好分。正如加里寧所說：『……我們的學校沒有可以使孩子們恐懼的地方……一年級生都驕傲地走入學校，像一個王子進入他的國土。』

我們的第一次『分班』會開過了，父母們望着他們的孩子們走入課堂，向他們說了一些叮嚀的話，都紛紛走開了。只剩下教師們和他們的新學生。這是一個責任重大的時刻，令人發爲深省。

我們國家正走向共產主義。今天入學的兒童，明天就是共產主義社會建設者和公民。而我們被國家委託培養他們擔負這個崇高的任務的工作。

蘇聯教師的首要的任務是訓練我們青年一代擔負建設共產主義的工作。但爲着建設就需要有知識。所以，我們首先必須給學生們打下一個全面知識的鞏固的基礎。

我強調「鞏固」二字。教給學生的材料都要經過他們消化、被他們記住，這是蘇聯教師的責任。第十年級將畢業的學生，應當深刻地掌握了他所學習的一切。他的畢業證書證明着他對獨立研究或工作和走上人生的道路有了充分準備。學校的任務是給未來的公民廣義的培養和教育。在我們看來，這是一個單一的、完整的過程。

當然，「教育」二字並不是對每個人都有同樣意義。一個美國作家告訴我們，洛杉磯一個教育「名宿」，安德魯·寇甫上校曾說道：『教育就是集一些青年於課堂，從書本上教給他們一課，聽他們背誦，用數目字記上分數，……我們就作這些，沒有別的。』

在我們看來，這是關於野蠻人的教育的野蠻的說明。這類事情，並不是教育，乃是兵營裏的操練，是使青年一代的頭腦愚鈍，妨礙他們自己運用思想，要使他們作資本家

的恭順的奴隸的一種企圖。

在我們看來，教育的意義是把青年塑成定型，有系統地深思熟慮地影響他們的思想



四年級學生們在上語文課。

和性格。至於這個影響的基本的方向，在我們腦中並不存在任何問題。我們的目的，是進行青年的共產主義教育。

我們教師要在十年內幫助把進入我校學習的兒童，養成良好的品格。他們七歲入學；當他們離校時，便是男女青年了。我們的責任是在此期間給他們以正確的指導，以便他們善於立身處世，使他們養成社會主義社會下新型人類的最好的品質。

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生熱愛他們偉大的祖國，瞭解它的光榮的過去並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光輝的未來。

我們逐日地培養他們有構成一個共產黨員的品質：無私地忠於人民和黨、誠實、勇敢、頑強、熱愛勞動、在困難面前堅持到底、隨時準備響應最先的號召，為保衛祖國而效忠。

我們的教師詩·耶·波加托娃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曾接到從我們的一個學生陶里亞·閔納耶夫的父親的一封信，其中簡單的、誠摯的幾行字，對我們來說，沒有比這更高的讚揚了。那信說：『我的兒子陶里亞來信充滿了愛國的情緒，爲了這件事，請你們

接受一個在前方的紅軍戰士的感謝。」

這一切是當我在歡迎剛入學的七歲兒童時出現在我腦中的一些思想。

(II)

如果你問任何一個有精深教育的人，文學中哪一個典型最能代表革命以前俄國的中學校的情況呢？那麼他舉出的第一個典型，一定是柴霍甫的小說「帶圍巾的人」中的體育教師魏里考夫了。這位魏里考夫總是提心吊胆地怕要「發生什麼事情」，他作了一些禁止性的訓誨，才能感到有些把握，而對於他所批准的或允許的事情，他總認為是「一個可疑的因素」。

另有一個典型，就是在同一篇小說中的「語文教師」，他常常告訴他自己，他不是兒童教師，而是一個官僚，是一個愚蠢、無情的人；他對於教書根本沒有興趣，不懂得，也不關心教育，而且也沒有對付兒童的方法。「他所教的東西的目的，對他是個謎，他所知道的，却是沒有目的。」



蘇聯作家協會的祕書長，法捷也夫（當中）和作家阿都洛夫（左邊）來校參觀。

索羅古布的「小魔王」中的裴里都諾夫是另一個例子。他是一個告密者、色情狂、打不起精神的人：是一個穿着教師制服而毫無足取的傢伙。還有科羅連科的「我同代人

物的歷史」中的德文教師科倫茲：「好像這個人開始時故意地，先把他所教的東西弄得全無意義，然後使他的學生還要記住它。」

我決不是說，在革命以前，中學校根本沒有另一類的教師。當然，在教育事業中有過誠實的、有良心的、有思想的人，這些人盡力給青年們以真正的教育和訓練。但魏里考夫、裴里都諾夫和科倫茲之流之作爲俄國文學中的典型人物，是並非沒有原因的。列寧在革命以前所寫的「論教育」的文章中，曾提到裴里都諾夫，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因爲在當時像魏里考夫那樣的無情的官僚才受到教育當局的鼓勵和提升。就是像他們這類人物來造成中學校的氣氛而且要別人都照樣做。無怪乎在「帶圍巾的人」小說中的一個典型的人物談到魏里考夫時說：『我們教師都怕他。甚至連校長也怕他。請想想，我們教師都是有學問的、正直的人，深受屠格涅夫和謝德林的感染的人，但是這位總是穿着膠皮鞋打着雨傘的人，使那個中學校受他控制達十五年之久！』

爲什麼是這樣的情形，是很容易解釋的。沙皇政府在教育方面的目標和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背道而馳的。政府千方百計要使學校跟實際生活隔離。圍繞着學校的許多極其重要的關於世界的消息，是不讓學生知道的，而他們則被灌輸一些所謂「經典的」教育；科學的課程被減少到最少的限度，科學史是被忽視的，不認真地教給學生俄國文學，中學校的學生却被迫去記憶希臘文課文和一些文法的例外——這一切都是爲了限制他們關於實際生活和實際世界歷史發展的知識的。

在這種制度下，一切都是乾燥的，沒有生氣的、窒息人的。教育部對於社會中進步的、革命民主派進行着接二連三的極其殘暴的迫害。賴斯加福特教授在他對衛爾斯基所

著「一個小學教師的筆記」的序言中說：「我們並沒有學校；我們只有改造所。」對於這個說法，沒有人會驚奇的。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使國家的教育政策和社會上進步派別的希望間不幸的衝突不再有了。今天，在我國，國家和人民對學校都要求同樣一件事情：要他們給正在成長的一代一個廣泛的唯物的教育和共產黨的訓練。

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和每一個蘇聯的家庭都惦記着一件事：他們都希望學校把馬克思列寧科學世界觀的基本原理印入我們兒童的腦海。我們都理解，學校的教育，必須在進步的科學最新的成就的照耀下來進行。自然科學的教育，應當根據被米丘林和李森科發展了的達爾文的學說。在歷史學課程內，我們的男女學生應當學習西方是怎樣頻繁地受過俄國科學家和發明家的有力的影響。

在我們的學校裏沒有特殊的「共產主義教育課」，同時也不可能。每一課都要教授一些新的東西，它們能夠擴大學生們的視野，在他們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基礎上能再放上一塊磚頭，那怕是很小的一塊。

列寧曾說，把教育當作與生活隔離的東西，便是說謊的偽善，我們深信這個意見的神聖性。在我們的一切工作裏，我們是遵奉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的，那些指示說：蘇維埃制度是不許以對蘇聯的政策漠不關心的態度來教育它的青年的。一個教師沒有思想理論，不關心政治，這是我們不能瞭解的，也是不能容忍的。我們認為，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思想問題的決議，施用於我們教師的身上，如同施用於作家、戲劇家、影片生產者和編輯者一樣。

曾經讀過第一百一十中學校的寶爾·馬爾庫斯說：『一旦戰爭爆發，我們有些人變成軍官時，我們一定得教育我們的部下對於價值有正確的判斷。當徬徨不知所措的時候，我就要想像我們的教師在同樣的情形下將怎樣行動。』這件事也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是一個細枝末節，但它却是從豐富的生活中所擇取的一個片斷。

斯大林同志曾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相信蘇聯教師會認為他們自己是和作家們在這個光榮的領域內的共同的工作者。

當英國工黨政府提出競選的保證時，曾鄭重地宣稱：「所有的人教育機會都平等」。「教師雜誌」宣稱：教育應該『對富人像對窮人一樣，對於工人像對哲學家一樣，對於製針工人像對立法者一樣。』

這些鄭重的諾言和虔誠的意向的實際結果如何，已爲人所共知。「平等的教育機會」，在英國還是不存在的。仍然像從前一樣，富人的子弟還在特殊的學校裏受教育，而英國的百分之八十五的兒童却在所謂「公立」學校中受教育。這些無特權的兒童，十個人中只有一個人能上中學；至於大學教育，大多數人，甚而連夢都夢不到的。

若是相信吹牛的「美國之音」、「美國」雜誌、和其他美國宣傳的代言報刊，「平等的教育機會」在美國早已成爲事實了。但是若相信任何這類的事情，簡直是不可能的。

它之所以不可能 第一，因爲幾百萬的美國學齡兒童不能入學。我們可以確信，屬

於這一類的兒童，並不是商人和工廠主的孩子。可以注意的是在四十八州之中有十七個州通過了法律，允許兒童「因為他們過於貧困」可以不入學校。

再看一看美國的種族歧視，便可立刻揭穿那個國家「平等教育機會」的神話。在十七個州和科倫比亞區，立法把黑人與白人，在教育方面分開。對每一個黑人兒童的教育費平均只是一個白人兒童的教育費的四分之一。當一個紐約中學校的教師叫他的學生作一篇題為「怎樣改善黑白人間的關係」作文的時候，沒有一個白人的兒童提出一個民主的解決辦法。在他們所有的作文中，形式雖各不同，但是只有一個「思想」，就是由於整個的教育制度所印入他們腦海中的「思想」。一個學生說，他們學校裏的黑人是下等人。另一個學生說，他們（黑人——譯註）應當被降為奴隸，或者是把他們放逐到某個荒涼的孤島上，甚至他們全被毀滅，他都是毫不動心的。……

在我們蘇聯教育字典中，我們根本沒有像「平等的教育機會」這類的名詞。我們沒有這類名詞，因為這個問題在蘇聯根本是不存在的。這個問題已經在三十年前，一九一七年十月完全地永遠地解決了。